

生态虚无主义的样态透视及价值观批判

程明月 杜仕菊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生态虚无主义作为对生态危机的实质性遮蔽,是一种颠倒和异化的价值观。其表象化理解生态问题成因、弱化对生态环境后果评估、片面化解决生态问题,产生诸多消极影响。生态虚无主义根植于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传统,实则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重提马克思生态致思对于破解生态虚无主义具有启蒙价值:本体论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驳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实践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破解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制度层面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生态虚无主义的囚笼,以此全面展现中国消解生态虚无主义的智慧。

[关键词]生态虚无主义;异化价值观;诊治路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0)5-0056-06

作为虚无主义思潮在生态领域的衍生,生态虚无主义映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其通过表象化生态问题产生根源、弱化生态问题严重性以及片面化生态问题解决方案,以此达到“废黜”生态价值目的。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并进一步将生态文明纳入到未来人类发展进程之中,作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2]的重要论断。当前,学术界虽论述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但对生态虚无主义内涵的界定仍十分鲜见,更不必提对于此种错误价值观的批判。鉴于此,透视生态虚无主义千篇一律的表现样态并揭露异化价值观本质,进而探寻诊治生态虚无主义路径成为本文关切所在。

一、生态虚无主义的存在样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一批学者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弊端,尼采高声疾呼的“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既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叛,也指证虚无主义的登场。当虚无主义渗透到生态领域

中并遮蔽个人本真生态价值观的同时,也促成生态虚无主义的产生。具体说来,生态虚无主义在理解生态问题成因、评估生态后果以及探索解决路径3个维度上呈现几种样态。

(一)表象化生成原因:抽象人性论及社会制度缺陷

生态虚无主义的首要存在样态是表象化生成原因。通过强化浅表思维和弱化批判思维,达至遮蔽生态问题内在发生机制。理性思维具有透过杂乱无章的“知性材料”把握事情本质的能力,个人理解事物遵循从表象趋向本质的认知规律。而生态虚无主义采用的表象化逻辑将熟知上升为真知,用表象代替本质的做法更符合大众浅表思维定势,因而易于被认知水平有限的人群所接纳,这种逻辑体现为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从个人层面来看,生态虚无主义将生态问题视为贪婪人性和消费观念异化使然。一方面,尤其是第三世界等贫穷国家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负首要责任。弗朗西斯·福山提到,“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要么是为贫困所迫除了开采自然资源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要么是根

杜仕菊: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ZDC007)阶段成果

本没有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社会规范，”^[106] 贪婪人性助长破坏环境行为。另一方面，在社会化大生产全面展开的国家之中，经济水平的提高滋生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的盛行。生产者在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不惜以消耗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持续供应商品；消费者在现世享乐主义目标追求下则购买快销商品、享受生态旅游等。生态虚无主义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分析生态问题成因，由于贴合大众情感体验和生活实践易被接受，但忽略任何个人都是处于社会经济生活事实中“现实的人”。

第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生态虚无主义将生态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因而带有浓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当前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存在经济富裕和生态优美现象，但生态虚无主义据此表象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恶化、资本主义制度与改善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做法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方式而无法深入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去，因为对该问题的探讨实则关涉到全球产业链的分工问题。此种通过制造两种制度在生态环境上的反差旨在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二) 弱化评估后果：“非历史性”存在的生态问题

生态虚无主义另一存在样态表现为弱化生态后果评估，即主张生态问题古已有之而将其视为“非历史性”存在。事实上，生态问题的当代流变异质于古代环境问题。社会关系对于自然环境的渗透是当今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古代环境问题尽管也受人类活动影响，但更多则由地球自身物质运动规律所致。而生态虚无主义简单化生态问题的“历史性存在”从而遮蔽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此种遮蔽由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操纵并混淆大众视听。

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生态问题呈现如下“历史性”事实：即当今生态事件及其后果的同质性。古代偶发生态事件由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仅具有个案性，即使重演也局限于地域内部；现代社会中当资本逻辑物质统一性趋向于社会关系统一之时，生态后果在时空延展中表现出相似性。时间维度上，现代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超出生态阈值，代际传递则使同样生态事件在未来上演；空

间维度上，生态后果一方面不断突破地理空间（如社会、地域、国家、全球等）和物理空间（大气层、外太空等）而呈现加速扩散趋势，另一方面生态威胁对内不断侵蚀空气、食品、土壤和水等日常生活微观领域而呈现无限弥散特性。

毋庸赘言，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于其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通过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得以联结，进而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命共同体”。令人遗憾的是，生态虚无主义罔顾当今生态事件的同质性事实，对生态问题作出非历史化及自然化阐释，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构筑起来的。他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带来而引入了一种新的风险景象。”^[149]2012年6月，大卫·格里芬进一步阐述到，“而对生态危机来说……它不需要任何人特意去做什么事情就能够终结我们人类的文明。”^[5]

(三) 片面化解决方案：意识能动性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

生态虚无主义的最后一大样态表现为片面化解决方案。对生态危机背后真实事态的错位指认必然影响探寻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生态虚无主义表象化生态问题成因、弱化生态后果评估，在改善生态问题的方案上所呈现的片面化样态，是一种将细枝末节的解决方案抬高至治本地位的做法，解决方案被简化为个人意识能动性及科技进步的手段。

第一，个人意识对于环境改善具有能动性。生态虚无主义认为无论是精英人物亦或普通大众意识均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于主张精英智慧论而言，其认为各国精英智慧能够提供有效应对环境问题的方案。福斯特对此持相反意见，“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的忽略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他们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改善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106]。于生态道德主义者而言，其认为只要普通大众能够提

高环保意识、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行为等就能扭转当前恶化的生态局面,因为个人道德立场在诸如繁衍、消费以及商业等领域的转变是整个社会道德提升关键所在。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有助于弥补社会发展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裂痕。其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市场调节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积极要素:一方面,生态虚无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先进的科学技术逻辑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万能法则。另一方面,彻底的市场化有助于扭转生态恶化局面。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配自然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引入环境治理领域能够有效约束企业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然而缺乏必然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凌驾于生态之上的经济帝国——一种取代不再奏效的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6]18} 仍然是一个留待思考的问题。现代性遭遇已经证明生态问题与现代生产方式变革、西方文明中心论蔓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调整以及发达国家霸权有着天然亲缘性,因而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细枝末节的小修小补无济于事。生态虚无主义描绘单一手段即可破除生态危机的图景,通过利用人们思维局限而将某种视角无限放大,辅之以各种途径强化此种语境,从而以偏概全,以局部替代整体。在这种片面化思维逻辑强势进攻之下,社会大众相信生态危机可被轻而易举的解决使得生态问题无足轻重。

二、生态虚无主义之异化价值观批判

纵观生态虚无主义存在样态得知,尽管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并局囿于“探讨”生态问题,但作为异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本质并未丝毫减弱。此外,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国人价值观的结构性错位是滋生生态虚无主义的现实土壤。换言之,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国发育现代性的遭遇和结果。因此,不能仅从形式对生态虚无主义存在样态作出考察,只有从现代性本身入手把握生态虚无主义内在机制及哲学基础,才能对其异化价值观本质展开批判。

(一)内在机制:资本逻辑致使自然“商品化”

作为“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的生态危机植根于

资本逻辑。资本作为现代世界的本质依据,使彼岸的圣经信仰展开世俗化进程。此外,增殖作为资本的基本原理,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妄图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本转化率”最大化。资本作为配置现代社会资源的手段,致使自然“商品化”的历史逻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资本逻辑的出现对自然“祛魅”。近代之前与生产力低下相伴而生的是自然作为“宗教”存在,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活动原则须遵循“自然本性”,此时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预定和谐”。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出现分离,自然作为生产资料被加以“资本化”,此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彻底颠覆人与自然和谐。第二,资本逻辑的展开导致自然界发生“贫困积累”。剩余价值的投入和再生产所形成的“循环圈”构成资本扩张总体机制,此扩张机制只有依附物质载体才能形成物质化客观力量,因而造成资本对于自然界自然力、人的自然力以及社会劳动自然力的吸吮以实现价值增值。这个过程离不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进步强制”,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系统成为破坏自然环境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源源扩张的生产力系统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更强大的力量来汲取自然界的自然力,由此导致正反馈循环必然加重自然界的“贫困积累”。第三,资本的私人目的有悖于社会公共福祉。自然资源作为全社会的公共产品,理应是一种分享、共享和他享的存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马克思则一针见血指出资本私人占有制的唯一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7]14} 目的的实现需要作为私人支配社会资源的市场权力扩大,并造成对于公共利益的僭越。

此外,资本作为特定社会历史中的生产关系,暴露生态危机背后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资本将自然“商品化”遵循交换价值逻辑,此种逻辑脱域至精神领域而遮蔽个人本真生态价值观。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实质上反映个人欲望的伸张,“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由此引发环境正义问题。

(二)哲学根基:主体性哲学助推自然“质料化”

资本逻辑与主体性哲学共同分享生态虚无主义前提,正如前者构成生态虚无主义形而下的“世

俗基础”一般,后者在观念领域助推自然“质料化”完成,二者存在本质上“共谋”关系。当今生态事件及同质性后果已经部分表明如下事实:将原因归结为抽象人性论或社会制度缺陷无疑具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即对于现实感性经验的亦步亦趋。而生态虚无主义反映了从属于现代形而上的主体性(“我思”)哲学对于对象(事物)的支配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在这一基本建制下彻底翻转。

笛卡尔对于主客体设定的“我思”哲学以及培根倡导的“自然科学”工具论使“混沌”的自然沦为“质料”的自然。第一,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将自然作为客体纳入理性反思范畴之中。主客体范畴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神创世说,自然万物是神创造的客体对象;近代以来全部形而上学的基本状况是从“我思”出发,从意识的内在性来把握自然,此时自然存在不再是自身被显现的本质,也不具有自在性,而是“附属于人的计算,服从于人凭借科学理性对自然的统治。”海德格尔晚年将现代形而上学理解为“对作为存在者的自然进行控制和统治”,^[9]质言之,笛卡尔从“意识的内在性”出发来把握自然的要求产生如下障碍:丧失“本己的存在特性”的自然被深深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10]第二,培根倡导“新自然科学”论彻底开启“人对自然的宣战”。古希腊时期旧自然科学是关乎宇宙和人类秩序,自然作为形式是衡量作为“质料”的世间万物之尺度,因而具有本体论、决定论和始基作用。培根的“新自然科学”根本性颠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不再作为形式规定人类,相反,人作为主体“为自然立法”,随后使工业革命肇始的现代性发育遭受生态破坏的代价。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主体的人类成为世间万物的中心,自然界作为工具仅剩服务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

综上,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博弈本质上从属于现代性命题,理解生态虚无主义蕴藏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无论如何要深入社会历史现实之中,透过生态危机表象以做出哲学追问。若将以上分析仅仅理解为对于生态危机的观念论概括的话,也同样犯了错误。这正是因为生态危机不仅依赖于由主体性哲学所展开的、对于自然的统治形式,也依赖资本所制定的世俗基础,二者结合方能

成为“座驾”自然的物质力量。因此,对于生态虚无主义的分析不仅要看到资本逻辑主导下将自然“商品化”的经济事实,同样要分析经济事实立足的哲学基础架构,即由现代形而上学所规定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分析中才能找到诊治生态虚无主义的进路,这里我们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2}

三、生态虚无主义之诊治路向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一国发育现代性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全球化场域也使得该问题上升为关切人类生存的题中之义。值得警惕的是,生态虚无主义作为隐形的社会思潮,借助颠倒的生态价值观侵蚀民众,这势必阻碍国人探索化解生态危机的出路。重提马克思生态主义思想对于破解生态虚无主义仍具启蒙意义,在本体论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驳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实践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破解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制度层面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生态虚无主义的囚笼,以此全方位展现遏制与消解生态虚无主义蔓延的智慧。

(一)本体论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驳斥形而上学哲学基础

生态虚无主义作为对生态问题的价值颠倒,本质上暴露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弊端:资本逻辑与主体性哲学的联姻。这种文明机理的蔓延体现为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压缩的机械时空观以及异化消费的生活方式上,必然引发生态价值的虚无化。与此相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承继以及作为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地位为破解生态虚无主义提供理论可能。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自然观为理论底版,是批判生态虚无主义的“理论武器”。生态虚无主义归根到底奠基于主体性哲学基础上,“感性—对象性活动”作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存在论基础,恰恰在超出主体性哲学之际而获得自身的意义领域,因而马克思自然观是对现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贯穿。此外,唯当自然作为自在存在而

获得内在价值之时,“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187}而“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范畴,不仅是马克思自然观在当代的拓新,更在实现“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统一的基础上,弥合西方发展模式悖论,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呵护人类享有共同的善,从而成为引领世界走出生态困境的中国方案。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扫除生态虚无主义的存植空间。此种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从政治高度看,“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11]448}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于美好环境的需要成为评判党执政的重要加分项;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看,“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12]9}与此同时,当前无法回避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短板的事实,因而现代性的发育要时刻警惕资本逐利本性以及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谋划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全人类发展高度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1世纪“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内在要求世界各民族在生态环境上的通力合作,以往依循“零和博弈”思维对自然展开掠夺的发展方式只会导致代际不公正以及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二)实践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破解资本逻辑内在机制

罔顾社会实践是生态虚无主义的症结所在,因而破解生态虚无主义不仅要从理论层面澄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所在,更须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现实驳斥依据。“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544}

第一,时间维度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生态实践破解生态虚无主义。生态虚无主义由于信奉资本逻辑而罔顾生态恶化严重性,“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背后体现为非道德主义倾向。当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道义上有可能出现自然的缺席。与此相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具体国情,在带领人民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呈现逐步深化的历史逻辑。站起来时期,对于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的早期探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富起来时期,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专门环保部门的成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等措施反映中国共产党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构建完整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以推进供给侧改革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以生态经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举措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觉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

第二,空间维度上,以国际和国内展开的生态实践破解生态虚无主义。在生态虚无主义淡化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时,中国的生态实践不失为世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可行之路。国际层面,仅就应对气候变化而言,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提前3年实现减碳排放40%—45%的承诺;除此之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国内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贯穿在城市发展和个人生活方式中。绿色发展是城市职能的内在属性,例如推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标志着生态文明的顶层战略在城市发展实践中的落实。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也关涉个人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变革,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以个人生活方式为源头改善社会公众的生活环境。

(三)制度层面: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生态虚无主义囚笼

为了转移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生态虚无主义炮制精英、科学技术以及市场万能论等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工具论层面并未触及问题根源,良好制度设计才是走向未来生态之路的可行方案。“只要他们有自觉,基本政治问题仅仅是一个人实际能够接受的国家之良好组织”,^{[13]160}因而配齐并落实一系列生态文明管理和法律制度体系,才能根本上筑牢防范生态虚无主义的囚笼。

第一,纵向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素,是对生态虚无主义的纠偏。生态虚无主义内生于现代性发育过

程之中,本质上背离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被不合理的制度加以强化。迄今为止,标志现代性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已暴露弊端,卢梭对此认为后来意义上的法律,不过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结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领域入手诠释中国制度,全方位定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现代性发育之路。其中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生态文明的制度设计坚持以人、自然与社会的长远发展为价值目标,以为人民群众创造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为价值立场,并坚持生态文明制度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制度的协同配套。此种做法说明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维度中,并将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纳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中,从根本上对生态虚无主义做出制度纠偏。

第二,横向上,生态文明制度作为环环相扣而非单项的制度体系,全方位扎紧生态虚无主义的囚笼。生态虚无主义提出的市场调节、技术改进和精英治理等措施本质上是对“资本道德”的伦理依赖,只有严格的法治约束才能杜绝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针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要尊重各个治理主体的职责与功能,实现协同共治,而且要遵循生态环境治理的阶段性规律,实现全过程覆盖。一方面,着眼于治理主体,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需要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14]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过程。作为一项内容繁杂以及周期长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依靠个别精英主体的单方面努力而完成。另一方面,着眼于环境问题的发生过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从“源头严防、过程严控、后果严惩”3个阶段入手进行制度设计,涵盖源头治理制度建设、过程管控制度建设与追责惩处制度建设,从根源上预先防治对于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而非利用科学技术对已然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事后补救。

生态虚无主义作为虚无主义在生态领域中的新变种,内在关联于现代性某种程度上的失范,从而妄图达到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修正甚至解构目的。新时代重提马克思的生态致思,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在明晰现

代性本质后,全方位展开对生态虚无主义的批判,在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相得益彰的同时,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基。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
- [3]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5] 格里芬,鲍宗豪,鲁品越.以人类文明审视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美国后现代主义著名思想家大卫·格里芬与鲍宗豪、鲁品越教授的对话 [N]. 深圳特区报,2012-11-06.
- [6]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F·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3]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 [1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新华社,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03/content_5486380.htm.2020-03-03.

[责任编辑 李紫娟]